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英国本土的 公共福利

〔英〕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英国本土的
公共福利

[英] 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马清槐 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英] 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马清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13-2/F·120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02千

印数 1101—3700册

印张 5 插页 4

定价: 2.9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9年先后分五辑印行了名著二百三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1年6月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描写十六世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重要著作。1581年最初用《略论英国政策》书名出版，作者署名为S. W.。中译本所据版本系1893年由伊丽莎白·拉蒙德根据原著整理编校而成。

全书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参加对话的角色有手工业者、庄稼人、博士和爵士五位不同等级不同身分的人。博士是对话人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话代表了作者的意见，贯串着全书的基本思想。

全书的结构分三层，即三次对话。第一次对话，表述了各类人物对当时一些现象的不满，以及他们如何就遭受不幸的原因相互埋怨。这里反映出英国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二次对话既谈存在的问题，又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第三次对话，提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

按照博士的说法，当时英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这种普遍的、全面的物价上涨现象，是所有的人对之颇有怨言的最主要的不幸事件。其次是我国财富的耗竭。第三是圈地和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的行径。第四是城镇、教区和乡村的凋敝。最后，人们对宗教的意见分歧和差异”（本书第104页）。当时英国的中部，把公地圈为牧场已进行到很大的规模，大量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因而农业日益凋敝。贵金属从新发现金银矿的国

家(特别是美国)涌入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对铸币实行剪币和掺假政策,又使商品普遍涨价,广大群众极为不满,不少地方出现骚动和叛乱。针对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博士之口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改革货币制度,确定金、银、铜币的正确比价;振兴农业,提高农作物价格,允许农民自由出卖农产品,使种地比放牧有更多的收益;保护本国的加工工业,扩大就业,并提倡消费者消费本国产品,本国能制造的工业品决不进口。

这部著作在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作。作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 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他说:“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本书第119页)。他主张发展农业,因为他认为“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本书第71页)。他反对发行分量不足的铸币,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我们的硬币质量低劣,改变了模样,外国人就伪造了我们的硬币,设法把大批大批的伪币运到这里来脱手,既换取我们的金银,又换取我们的主要商品”(本书第87页)。他不是按生产,而是按照货币的流向来划分行业,也是从只有金银才是财富的观点出发的。

2. 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利润是在商品流通中由于贱买贵卖而产生的,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出与内流,对财富无所增减。他在谈到如何恢复英国的财富时说:“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本书第

96页)。

3. 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杜绝本国财富外流。他说：“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自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本书第73页)。

4. 提倡保护关税，使用国产品，发展本国加工工业。他提出，即使有的商品本国生产的比进口的成本高，也应该买本国的。“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因为不管多么少的收益流往国外，对我们来说总是一项损失。可是，不论多大的收益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毕竟还是保留在国内”(本书第75—76页)。“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如果本国生产这些东西，就不仅“可以安排2万人就业”，而且“购买这些商品的货款则留在国内，并不外流”(本书第130页)。

这本著作一直受到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的重视，但本书作者是谁，曾引起人们的猜测和考证。本书在1581年初出版时作者署名为W. S.。由于该书是用对话体裁写的，文笔较雅，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有人推测该书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的手笔。但后来有人认为该书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到十九世纪末，伊丽莎白·拉蒙德在英国杂志《英国历史评论》1891年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该书作者进行考证的文章，认为该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而威廉·斯塔福德只是出版者。据她说，该书写成时间是在1565年，而W. 斯塔福德予以出版是在1581年，只不过在付印前作了一些

修改和变动,改名为《略论英国政策》,并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拉蒙德在 1893 年以编者拉蒙德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该书,书名也改为原名《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即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现在拉蒙德的看法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有关著作,如 E. F. 赫克谢尔的《重商主义》和 E. 罗尔的《经济思想史》等都认为此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根据拉蒙德的考证分析和国内的一般看法,我们取作者为约翰·黑尔斯之说。

原书最后有编者所加“注释”多页,均系按正文逐页说明两种手稿在个别用词上的细小差别或某一个词在甲稿(或乙稿)略而不述的烦琐考证,我们考虑到两稿的这些细微歧异并不妨碍此书内容的完整,所以没有把“注释”译出。

戴 芳

1987 年 11 月

目 录

简短说明·····	1
导 言·····	3
序 言·····	25
第一次对话·····	28
第二次对话·····	50
第三次对话·····	104
译名对照表·····	147

简短说明

当拉蒙德小姐意识到她不可能希望在她逝世以前编完这本书时，我承担任务来监督书籍的排印过程。她努力工作到最后一息。1891年8月11日星期二晚上，她花了一小时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对照剑桥大学收藏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阅读校样。两天以后，她旅行到她在爱丁堡的家乡，在接下去的星期天上午在那里溘然长逝。

拉蒙德小姐的工作计划草案制订得很清楚，但我感到责任重大，要力图完成她那要求严格的习性和不倦的耐心使她特别适宜承担的一项任务的其余部分，却非同小可。

当我承接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还有不少事情需要完成，而其他一些预先约定要办理的事项又使这种推迟出版的情况成为不可避免。拉蒙德小姐曾经准备好了本书正文据以排印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的抄件，以及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原稿的目录和旁注的抄件；她还根据兰巴德的原稿校阅了第一篇对话的校样。她在《英国历史评论》(1891年4月)上发表的文章连同她打算加以改写的一些暗示，提供了用以撰写导言的资料。有两三页的注释已经写成，但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彻底重新整理。导言和注释并不完全代表她的成熟的见解；在不止一处，她希望能够再次仔细检查一下论点的依据，虽然她的主要结论已经得到公认。(科萨：《导言》，第三版，第

198 页。阿什利:《经济史》,第一卷,第 260 页。)

为了所获得的热情帮助,我除自己表示感谢以外,谨代表拉蒙德小姐致以谢忱:感谢兰巴德先生,因为他同意让我们长期连续使用那部成为本书基础的非常有趣的原稿;感谢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局亲切地专门给拉蒙德小姐提供方便,让她核对他们所收藏的原稿;感谢三一学院研究员 J. D. 达夫先生就一些特殊问题给予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圣约翰学院研究员福克斯韦尔教授、伦敦档案局的休伯特·霍尔先生、格顿学院的 E. A. 麦克阿瑟小姐、英王学院的 F. B. 斯马特先生、苏黎世的萨普斯沃思教授,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的 A. 罗杰斯先生。

W. 坎宁安

1893 年 8 月 9 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导 言

一、

现今发表的这篇“对话”在其较早的形式方面有过一段稀奇的经历。它最初印刷于1581年，当时的原作者据称是W. S.；但现在看来，不管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同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毫不相干。他删去了一些段落，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大部分来说，他满足于修改暴露内情的语句，没有花什么工夫把工作做得合乎现代的要求。可是，虽然关于W. S.的姓名和身分已经产生了许多争论，人们对他有自称作者这一点却似乎并无重大的疑义。一位有胆量的出版商在1751年大胆地把这篇“对话”说成是威(廉)·莎(士比亚)写的；虽然这种突兀的意见使它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接受，但人们认为可以相信这本小册子是描述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国状况的作品。事实上，人们已经大体上承认它是描写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的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主要的权威著作，尽管它同哈里森笔下的内容有明显差别。然而，肯特郡的文物收藏家威廉·兰巴德在他那份“对话”上所写的按语却有效地排除了W. S.提出的自称为作者的理由，证明这本书早在它出版的那个日期以前就写成了。“请注意这本书是在1581年由一位W. S.用《略论英国政策》这一书名印刷出版的；另一方面，它早就出诸于圣托马斯·史密斯(象有人所说的)或约翰·黑尔斯先生(象其他人

认为的那样)的笔下,其年份在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六世当政的时代。我早就拥有的这份原稿,据我判断是在 1565 年写成的。”^① 这个资料从一种新的角度显示出了与“对话”有关的一切问题。这个新版本目的在于按照已知的最早形式提供这篇论文,并显示出 W. S. 在他于 1581 年付印前所作的修改和变动。我们不能再把作者是谁的问题看作单纯讨论 W. S. 的身分的问题,而是必须借助于论文的最早形式所提供的内在的证据来重新加以考察。如果我们认为“对话”的主旨在于记录一次实际的谈话,并审查它所提供的可能发生这次谈话的日期和地点的明确迹象,那么,可以用来推测的范围就很狭窄了;当我们确定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范围时,我们就能够考查证据,以辨明参加那次辩论的人物的真实姓名,特别是辨明那位叙述整个问题的爵士究竟是谁。因此,书面报道“对话”的日期问题应当被认为与发生谈话的日期问题截然不同。这种种要点经过仔细的探讨,就会接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对话”所涉及的事项和当时环境的性质,即使人们认为作者选定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段而已。

二、“对话”的日期

在我们找到一条线索,了解到谈话的日期应如何确定以前,我

^① 这个注释复制在插页图四上面。尼科尔斯在其关于兰巴德原稿的目录中(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肯特郡],第 512 页)提到它,但他把注释读作“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约翰·耶茨”。只要比较仔细地审查一下字迹,就可看出这是一个错误;H 的写法很特别,甚至兰巴德自己也不常用;但他偶尔采用这个形式,例如他在 1585 年 7 月 29 日一封信的最后一行所写的 Hallyng 一字中的 H 那样(不列颠博物馆科顿·朱利叶斯普通本第 25 页),在注明日期为 1584 年 12 月 2 日的一封信中也有这同一个字(不列颠博物馆兰斯多恩 43,第 44 页,第 21 号)。

们大可不必深入地仔细阅读“对话”的内容。第一句谈到英王陛下有关圈地问题的委任。关于这项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的重大委任,发生在早于1565年的1548年。在那一年的6月,任命了6位委员^①去调查英国中部一些郡的情况,因为那里把公地圈为牧场以饲养绵羊的做法已进行到极大的规模。这项任命的提出,是为了减轻民众已在康沃尔郡暴动中形成的不满情绪。然而,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委员们在某些郡的行动似乎已经给反抗提供了借口^②,在下一个夏季,人民“一部分为了圈地,一部分为了宗教,在英国多数的郡里爆发成为一场可怕的公开叛乱”^③。“对话”有几处提到社会骚动的情况,一位发言人说那些骚动是由于圈地,另一位认为它们起因于有关宗教问题的争端。如果说那次谈话确实发生过,那它一定发生在1548年发表任命圈地委员之后。

提到这个问题的其他几处地方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定具体的日期。博士抱怨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国内制造的一切布匹“已按最后一次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每英镑征收12便士的税则”课税。这项异乎寻常的实验曾于爱德华六世在位的第三年试行过。1549年通过了一项“在三年期间减少谷物、绵羊和衣服等商品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的法案”^④。然而,在这项法案实施以后,政府又逐步加以取消。1549年11月16日,“德文郡的若

①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149、268页。

③ 斯特赖普:《约翰·切克爵士》,第40页。

④ 第二和第三版,第六卷,第36章,第8、9节。《下议院议事录》,1548—1549年2月14日。

干服装商提出了恢复救济成衣业法案”的议案^①。同月18日,《下议院议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下议院议长先生应会同下院的国王枢密顾问和下院的十二名其他议员成为恳求人,通过陛下的枢密院以了解陛下的旨意,如果根据他们微末的恳求,他们可以在下午四时讨论最后一次救济成衣业和饲养业的问题的话。”^②这项请求得到了允准^③,11月11日一项新的“豁免最后救济法案中规定的饲养业和成衣业部分负担的议案,以及另一项准予再实施一年的救济谷物种植业的议案”,在下院初次宣读。^④它很快就通过了几个阶段,于1550年1月17日在上议院第三次宣读。^⑤因此,1549年夏是对国王支付特别津贴的仅有的一个夏季,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就是博士在对话中提到的那个夏季。

这篇论文还特别提到同一夏季的另一事件。在由商人之口发表的第一批谈话的一段中,他抱怨说,虽然引起开支浩繁的一些因素已被抑制,经济繁荣却并未增长。他所列举的开支增多的原因是“舞台表演、幕间穿插、五朔节游戏、通宵宴会、纵酒狂饮、狩猎赌博、摔跤比赛等等”。1549年8月6日发布了一项公告^⑥,“禁止赌博”。“国王陛下……命令其一切臣民……从目前8月9日起至下一次万圣节到来时为止,不得有任何人公开地或秘密地用英语表演任何形式的幕间话剧、对话或其他以戏剧等形式演出的题

①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一卷,第12页,1549年11月20日。

④ 同上书,第一卷,第13页。

⑤ 《上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381页。

⑥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270页。

材。”^①关于摔跤,在《赖奥思利编年史》的1549年部分记载着这样的事项:“摘要:郡长们的一所法院规定,由于诺福克郡和我国其他地方发生骚动,今年应当制止和停止摔跤比赛。”^②翌年,准许举行摔跤比赛^③,1551年准许举行“摔跤和射击比赛”^④。

此外,论文中关于铸币状况的述评同1549年的事态十分吻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博士说明,当硬币的价格上升时,商人们立即搜罗旧币,把它运出国外。1549年4月11日发布了一项公告,指出有些人已经如何把金币、特别是旧币运到国外去,声明要禁止这种行为,否则定予严惩。^⑤同一份公告还宣布,“海外有关方面的一些人企图秘密地大量伪造头像银币、先令、格罗特以及国王陛下铸造的其他银币,把它们运进我国”,因此责成海关对那些伪币勤加搜查。^⑥从国外运入的伪币在论文中也被提到了。“我国的旧币安琪儿以前不过值20格罗特,现在却值30格罗特了,其他的一切旧币不是也按这样的比例涨价了吗?可是我想,纵然银币的价格涨得很多,从原来的20格罗特涨到30格罗特,银币还是不可多得”(本书第89页)。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之初,安琪儿值8先令,在上文引证的公告(1549年4月11日)中,它涨到9先令8便士^⑦;1551年,每个安琪儿值10先令。这最后一项乍看起来似

① 《公告汇编》,页码66。〔不列颠博物馆 C. 12 .b. 17〕

② 《赖奥思利编年史》(卡姆登学会),第二卷,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42页。禁止幕间穿插演出的禁令要求普遍执行;但有关摔跤比赛的条文仅涉及伦敦,它似乎表明,禁令仅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看来有必要获得当地的资料以证实这个结论。

④ 同上书,第54页。

⑤ 《公告汇编》,页码30b。

⑥ 同上,页码32b。

⑦ 同上,页码31。

乎就是作者所提到的“值 30 格罗特的安琪儿”，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价值为 10 先令的安琪儿发行以前，人们对格罗特估定的价值已有两次下降，合 9 先令 8 便士的安琪儿在通常交易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当作至少值 30 个劣质格罗特的货币使用。^① 1551 年 7 月，格罗特从 4 便士降到 3 便士，同年 8 月又从 3 便士降到两便士，在第二年的 10 月格罗特被回收，在那个月份铸造的新币（10 先令的安琪儿占其中一部分）中，没有发行格罗特，至少没有发行 4 便士、3 便士或两便士的格罗特，而当时格罗特这个名称指的是 12 便士一枚的货币。^② 按“30 格罗特”计值的安琪儿很可能是在 1549 年出现的。

这里指出的各点十分清楚和确切地证明，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在描述他在 1549 年秋季所了解的英国的状况。

三、“对话”的地点

“对话”开头谈到 1548 年圈地委员会的那一段不仅指出谈话的日期，而且指出谈话的地点：它发生在委员们所到地区范围内的一个城市。这些圈地委员的巡视活动都有记载，所到地区包括牛津郡、伯克郡、沃里克郡、莱斯特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敦郡，而这些郡的仅有的几个城市是牛津、考文垂和彼得博罗。这三个城

^① 请参照《减少国币发行量等等的政策》。“如果他想把金币贮存下来，那么，他本来一部分按 6 先令 8 便士计值了三十年的安琪儿即将值 10 先令或接近这个数额。”第 8 页。

^② 请参照 1551 年 10 月爱德华日记中的记载。“委任铸造 5 先令、半个 5 先令、格罗特、6 便士、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事项随即作出决定，并签署文件。”《遗稿》，第 346 页。

市中的一个似乎就是举行“对话”的场所；其中两个可以立即排除在外，不值得考虑。在都铎王朝时代，牛津和彼得博罗都不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对话”所在的城市却与它们不同；彼得博罗也没有衰落，因为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企图复兴凋敝城市的法令中并未提到彼得博罗；商人和制帽商关于所居城市昔富今贫的怨言似乎并非针对那两个城市而发（本书第 32、33 页）。就考文垂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那里已经建立起了若干生产毛织品的工业，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前该城是个繁荣和兴旺的城市。该城的修道院以及其他宗教机构的遭受破坏使其面目全非。达格代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久以后变得一蹶不振，因为在不幸的经济崩溃以前常常大批聚集到那里去的人不见了，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不得不放弃那个城市。那时颇有名望的约翰·黑尔斯（他对历史的回忆现仍脍炙人口）曾向当时担任护国公的萨默塞特公爵指出，那时的居民不超过 3,000，而根据他的回忆，原来的居民却有 15,000 人之多。”^①

所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将同我们对考文垂了解的情况相符合。商人谈起的那所慈善收养院（本书第 33 页）很可能就是设在考文垂的福特慈善收养院，该院由于它那雕刻精美的木结构山墙而足以证明从前一位市长威廉·福特的乐善好施的可贵精神。他是经营主要商品的商人，设立那所慈善收养院的目的在于救济 5 个男人和 1 个妇女，他每星期给他们发一次生活费用。^② 该院建筑

^① 《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46 页。如果所说的 1479 年瘟疫夺去了该城 3,000 人的生命或者该城及其管辖地区 4,550 人的生命，这一报道并非虚构，上述关于人口的估计似乎不算是言过其实。

^②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84 页。

在方济各会修道士教堂的附近，所以按那时考文垂的边界来说是在“城市的尽头”。

有些地方谈到考文垂的贸易，他们纵然不是想要使人了解当地的特殊情况，也至少表明他们是非常关心该城的福利的；它的衰微据说与丧失一项主要的行业、即蓝纱线制造业有关（本书第 132 页）。此外，仅仅选择一个制帽商来为手艺人说明问题这一点是同我们对考文垂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合拍的，而那樣的说明如果应用于英国的其他各地，就不会合适；制帽业在都铎王朝时代似乎就已经散布很广，但在英国的许多地方，还没有顺理成章地把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确定为具有代表性的工匠；莎士比亚时代的工匠是没有一个从事这种行业的。然而在考文垂，一个制帽商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富裕的工匠，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制帽业是个规模很大的重要行业；在 1525 和 1533 年，一位制帽商曾当选为市长，到了 1549 年，这个职位由威廉·桑德斯充任，他也是个制帽商。1525 年，当制帽商尼古拉斯·海恩斯担任市长时，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圈地的活动（《旺利收藏品》，不列颠博物馆，哈利手稿，6388）。制帽商在“对话”中对庄稼人的重大疾苦表示的同情（本书第 60 页）在实际生活中有发人深省的类似之处。

四、“对话”中的人物

“对话”的意图是要由参加谈话的爵士把内容报道出来。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这篇论文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手稿中到处可见，而“我说”这一短语在爵士的发言中是经常出现的。爵士这个人物在开头的句子中也有所表明，因为他谈到他自

己曾亲自参加有关圈地问题的委员会，并安排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本书第 28 页)。按照委任条款^①，治安官也应出席，但那句子似乎是说爵士曾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这无论如何是同人们认为这个人物就是约翰·黑尔斯这一推测相符合的，因为他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惯常在活动开始时给人安排任务。他于 1548 年 8 月以及再次于 1549 年 8 月在考文垂忙于处理这项工作；在那中间的开会时期，他曾积极参与争取议会通过他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的三项议案的活动；斯特赖普对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经过已经加以论述。^②

表明爵士这位人物的第二个迹象出现在本书第 77 页，他在那里谈到，当一项抵制外国便帽输入的保护性议案被提出时他在议会的一段经历。这一问题几个朝代都曾有议员在议会提出；外国制造的便帽在 1512 年被禁止输入；1529 年撤消了禁令，并对外国制造的便帽规定了价格；这种安排似乎在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变动，并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又重新得到肯定。然而，在 1548—1549 年的会议期间，“关于礼帽和便帽的法案”被提了出来；它在 1 月 5 日和 24 日由下议院进行讨论，但以后似乎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亨利八世曾同法国达成协议，新近又签订了一项条约来巩固两国的关系，因此，维持同法国的协议无疑是很重要的；实施含有敌意的关税势必会给两国的关系蒙上阴影；它还可能产生同其他国家的矛盾。

爵士表示关切的另一点来自同一届

① 斯特赖普：《宗教编年史》，第二卷，第 350 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 210 页。



129 页)。在以三年为期放弃城市和城镇的世袭地的法令中,采用了一项特殊的条款,规定世袭地的地租仍应征收,其款项专门用于修葺城墙和桥梁,并使衰落的城市和城镇中的贫民有工可做。这个法令似乎是由黑尔斯负责处理的。^①

黑尔斯同考文垂的关系是密切的和重要的。他曾得到亨利八世赐给的圣约翰医院,连同修道院解散后拨给的大批房地产^②,并且他忙于奔走,把考文垂的衰颓情况向护国公详加陈述^③,希望另外获得一些特权^④。总起来说,他似乎很可能就是“对话”中爵士的原型人物。

有三种反对意见不妨在这里提一下。约翰·黑尔斯看来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而爵士讲起话来却仿佛他是对军事有经验似的(本书第 36、93 页)。黑尔斯跛足^⑤,以具有畸形脚的黑尔斯著称。此外,黑尔斯并非爵士;他担任过与财政部有关的宝贵职位,因为他是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秘书,但他看来从未得到任何高于乡绅的地位。还有,爵士谈到他的儿子(本书第 33 页);但黑尔斯没有结过婚,他的产业传给了他的侄子。

II. 没有具体地提到一些线索,能够使我们认出“对话”中博士的原型;但是有许多笼统的考虑使我们至少能够认定这个人物

①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1549 年 3 月 1 日。

②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80 页。请参照本书第 51 页。

③ 同上书,第一卷,第 146 页。有关这个问题的法令,已于 1549 年 1 月 12 日在下议院提出。《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 6 页。

④ 一件新的特许状最后同意给予额外的特权,见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46 页。

⑤ 同上书,第一卷,第 186 页。

是从曾经担任伍斯特主教的休·拉蒂默那里汲取的。在其著名的布道中,拉蒂默谈到了博士所论述的许多题目——圈地、降低成色的铸币、高级教士的玩忽职守和各大学的衰败——他关于这些论题表示出来的观点非常类似出诸博士之口的见解。除了博士发表的言论以外,如果我们再注意他闭口不谈的问题,那种可能性或许就更加明显了。拉蒂默是个改革者,但他相比之下不大关心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的教义问题^①,关于这些论题博士谈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及。而且,谈话中间没有谴责修道院,也没有对这些机构脱离教会管辖这一点表示热情;同时我们也许记得,在“新学派”^②的主教中只有拉蒂默竭力主张在每个主教管区保存两所修道院作为研究新学问的中心。博士担心研究学问的气氛遭受挫折(本书第36、44页),这似乎是同拉蒂默对此问题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剑桥大学期间,拉蒂默曾经热心主张用英语翻译和传播《圣经》,本书作者对此也许是赞成的(本书第36、142页)。然而,博士关于在尚未成熟的条件下竭力主张运用个人评判的权利这种观点(本书第143页),使人想起拉蒂默出席评判委员会以判定肯特郡的琼氏有罪的情景。拉蒂默要求实行的其他改革主要是关于包括勒索捐献在内的教会积弊。作为一名教区牧师,以后又作为一名主教,他曾坚决认为一位常驻的牧师具有重要的意义^③,事实

① 请参照他的传记作者吉尔平和德莫斯对他的性格和观点的概述。

② 指十五、十六世纪对于在英国传播的宗教改革学说和原文《圣经》进行研究的——译者

③ 吉尔平:《拉蒂默传》,第46、59页。

上，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改革教会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改革教义。由于他对所需要的主要改革的性质抱有这种看法，他发现追随他的人为数较少；但这种看法显然是博士所坚持的（本书第 136 页）。

无论如何，拉蒂默在考文垂那一带也颇负盛名。沃里克郡的一部分曾包括在他的主教管辖区之内，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他在巴克斯特利居住的时间很长^①，贝肯以极大的兴趣回顾了亨利八世在位的后期同他在该郡晤见的情形^②。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根据“对话”来推测，博士占有牧师的地位（本书第 135 页），并且也许是一位主教（本书第 138、139 页），但他在谈话中并未表现出他实际占据高位和负有重大责任的迹象。他发表的议论肯定同拉蒂默在谈起自己时只讲过去的情况这一习惯的态度相一致^③。

这些巧合至少是奇怪的；我们不应当希望在“对话”的语言中找到与教堂布道坛上使用的语言相同。拉蒂默的布道态度是十分激烈的，他的席间闲谈无疑地在格调上大异其趣。博士唯恐自己话讲得太随便（本书第 57、117 页），这同拉蒂默在激烈的发言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时有所保留的态度不谋而合^④。然而，在 1550 年拉蒂默关于大斋期的布道和“对话”之间，有两点巧合得相当奇怪。有关滕特登尖塔和桑威奇港的故事终于在布道中讲了出来，而博

① 达格代尔：《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 1054 页。

② 贝肯：《著作集》，第二卷，第 426 页。

③ 拉蒂默：《讲道稿》，第 154 页。

④ 参照拉蒂默的《讲道稿》，“我对你们讲的话很不客气，但我用的是拉丁语而不是英语，是对教士而不是对教外人士讲的，”第 46 页；“我曾在你们这个边远地区讲道，就象我在公爵大人面前讲道一样，是个十足的傻瓜，”第 135 页。

士在“对话”中则对此作了不正确的比喻(本书第 106 页)。在同一次讲道中,威廉·沙林顿爵士被举出来当作要求恢复原状的事例;对于他的行为的这种非常宽宏大量的看法,不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议会的心意。在“对话”中,一位名叫奈特的造币厂官员被列为具有同样美德的例子。使得这种无独有偶地间接引证事例的做法显得更加奇特的是,讲道是在 1550 年才开始的,而“对话”则似乎可以说是在 1549 年秋季举行的。如果它们并非单纯是巧合,它们很可能是作者依稀地回想起拉蒂默在谈话中所用的例证的结果,后来拉蒂默又在讲道时采用那些例证的。

在一处地方,博士的见解并不确切地同拉蒂默在关于同一论题的讲道中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在讲道中,他只是谴责了贪婪和贪欲;在“对话”中,博士所采取的方针为承认追求私利是一种可以由贤明的政治家指挥的巨大力量。这种关于个人私利的注重实际的原则,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显然盛行一时,但它在作者撰写“对话”的时候却并不常见。它在黑尔斯的《指控》、拉蒂默的《传道讲稿》或斯塔基的《对话》中没有地位。斯塔基曾谈到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有可能并行不悖的理论^①;他说波尔^②认为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互不发生矛盾的状况是可以达到的,其办法是教导人们了解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归根结蒂包含在国家的利益之中,如果他们促进国家的利益,他们最后也就会在实际上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博士提出的控制和指导个人私利的意

①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国》(E. E. T. 协会),第 33 页。

② 雷金纳德·波尔(1500—1558),英国红衣主教,罗马天主教最后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

见却比较切实可行。拉蒂默很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但认为没有必要在布道坛上强调这个问题。

III. 我们似乎没有希望能够辨认出“对话”中三个比较次要的人物即庄稼人、制帽商以及商人或布商中的任何一个。仅在一处有个线索足以表明，任何具体的个人都是经过考虑的。本书第 33 页上布商谈到了他的岳父，这位岳父不久以前已经恢复了该城旧有的税则，希望这个当时有些凋敝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救。在考文垂的文件堆中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查找，也许最后可以弄清这位关心平民疾苦的人的身分，并使我们能够发现此人的女婿是谁。我们已经作过努力，企图解释恢复该城旧有税则的经过；如果这一点得到确定，那么威廉·威奇斯顿似乎就是那位经营布匹的商人，他那时也许还活着，但在 1549 年他一定是很老了。关于制帽商和庄稼人（他又是牧场主，见本书第 68 页），根本无法推测他们是谁，除非把他们当作手艺人或庄稼人的典型而外，似乎不可能又作别论。此外，制帽商威廉·桑德斯在 1549 年担任考文垂的市长，作为牧场主或屠夫的 R. 尼克林于 1550 年继任此职，可以说是一件奇怪的巧合。当时一些不同职业的著名公民可能很容易跟拉蒂默和黑尔斯欢聚一堂。

五、原作者

关于作者身分的仅有的一些迹象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因为他在那里提到关于他自己的三件事实。他不是国王的枢密院成员；他是一名议员，有一段时间辞掉了其他职务。也许可以更概括地说，无论在政治问题还是在宗教问题上，他一定对于博士这位公认

的代言人的观点表示同情；他是个学者，博览群籍的造诣使他能够按照他那种方式提出论据，其中多处涉及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

根据兴趣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似乎最有可能大约在这个时期写出这样一篇论文的人是约翰·黑尔斯，我们在前面谈到他的时候认为他也许就是“对话”中的爵士的原型。他的生平事迹似乎表明，他的情况可以符合序言中列举的一切条件。他是一名议员，在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届议会中代表兰开斯特郡的普雷斯顿港出席会议^①；他并不是1553年议会的议员，在他于1562年代表兰开斯特议员选区出席会议以前也没有进入其他任何一届的议会^②；另一方面，他看来没有在国王的枢密院任职^③。他的“答辩”指出^④，1549年夏季他在英国，但另一项有关他的线索表明，他曾一度离开英国，可能是由于圈地问题委员会引起的风潮。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黑尔斯也不了解他的行踪，因为前者在1550年5月24日写信给格尔特的时候还请他万一前往苏黎世时务必代为向他的哥哥问候^⑤；1552年，约翰·黑尔斯肯定是在施特拉斯堡^⑥；在女王玛丽统治的时期，他住在国外；我们在法兰克福的英国流亡者中

①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6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375页。

②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8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404页。

③ 但请参阅本书第125页。

④ 《枢密院法令》有几处地方提到付款给他的事情，他显然是在1547和1548年以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秘书的身分领取那些款项的：最后一次是在1549年2月25日。在以后几卷没有出现黑尔斯的名字，但我们掌握两封信件，一封是写给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主计员波尔的（1551年12月26日），一封是写给收纳处的（1552年12月29日）。

⑤ 《原文信件》（帕克学会），第99、100号，第188、189页。

⑥ 克兰默：《著作集》（帕克学会），第435页。《苏黎世信札》（帕克学会）中可以看到他的签名，由此推断也许能在苏黎世找到有关他在“对话”中讨论的问题的文件。承蒙萨斯普沃思教授仔细查找，但毫无结果。

间听到有关他的情况^①。我们可以说，他在大陆的时期是会摆脱其他事务，抓紧时间根据他在 1549 年的亲身经历，撰写这篇关于英国状况的论文的；这也有助于说明所提到的较晚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对布匹大量增税的措施。

也许有过一次实际的谈话至少给“对话”提供一点启发，正如托马斯·莫尔在考文垂发表的谈话一样，而登场人物也许是从一些知名人士的原型得到启发的。凡是表明爵士可能从黑尔斯脱化而来的迹象也足以显示出，黑尔斯所具有的专门知识使他适合于成为“对话”的作者；有一两句话使人想起他的“指控”；但想要全部用文学笔调加以表达的企图，可能已经产生那种在描写和比喻上特别明显的偶然意义含混的弊病。当时爱好文学的兴趣在把人物冠以虚假名字的其他对话中也有表现^②，这种兴趣很可能使一个作家过分倾向于忽视明确的关联，使人物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例如他写道，“我曾经在一届议会中……”（本书第 77 页），而那时他却是在谈到上一届会期的事情。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偶然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文学笔调的联想，它作为谈话的内容显得文采飞扬，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的笔下缺乏事实根据。

就总的情况而论，黑尔斯当然可以说是他的同情和关切的情感贯串了“对话”中所谈论的一切问题，他那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把问题写下来，另外他还有机会清楚地了解当时考文垂及其附近地区的状况。也许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如果说他是

①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三卷，第 404 页。

② 如在莫尔的《乌托邦》、威尔逊的《高利贷》或贝肯的《珠宝》中。

作者，那么为什么象威廉·兰巴德这样的同时代人不了解所谈到的事实呢？可是，黑尔斯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虽然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得到器重，但由于他发表了有关王位继承问题的意见，不久就失宠了。他可能不愿承认或发表(本书第 26 页)一篇反映亨利八世和爱德华手下枢密顾问的智慧的对话(本书第 109 页)，他关于教会问题的观点似乎比博士发表的见解先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对话”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印刷出版，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有这种分量很重的内在证据足以证明约翰·黑尔斯是“对话”的作者，但根据威廉·兰巴德的另一种意见，也有几分可能认为“对话”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作品。按写作日期推算，他那时是大臣和枢密顾问，但他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并不是会议员。他受聘担任大臣，于 1548 年出任驻布鲁塞尔大使。他似乎曾经潜心研究教会问题，但他好象同圈地问题委员会无关，当圈地运动引起人们密切注意时，他不在英国；此外，没有听说他同考文垂城有任何关系，他在 1549 年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自己的业务。他很关心有关铸币的问题，但他的观点似乎同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斯特赖普这样描述道：“当头像银币（在亨利八世时期曾大量铸造）和其他劣质硬币最近经过磋商要加以纠正时，史密斯也在这方面受人利用，写了一封信给护国公，谈到造币厂在铸造这类货币时所产生的利益，从而使人比较清楚地了解这本即将出版的著作。”^①但是，这样概括地说明的观点看来显然是在“对话”中受到谴责的(本书第 48、95 页)。斯特赖普遗憾地说，当他写书

^① 斯特赖普：《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传》，第 36 页。

的时候,这篇文章连同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其他文件都遗失了。现在看来,这篇遗失的文章在内容上可能同题为《使英国本土臻于繁荣富裕之境的政策》的手稿相一致。这篇文章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它写于1549年,其中不乏堪与“对话”媲美的饶有趣味的论点。那部手稿现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保存。

六、手稿和版本

I. 威廉·兰巴德先生收藏的手稿,如今仍由其后裔保存,内容颇饶兴趣。它是小四开本,所用的墨水异常精美,用精制羔羊皮纸装订成册。它写于1565年,因此是在约翰·黑尔斯先生生前的时候。

尼科尔斯在《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中提到这本手稿。装订是原始的;因为纸边比较粗糙,每行末一个字母纤细的向上一勾往往写到下一页边上,这些都足以证明,纸张似乎不可能在写上字以后重新经过装订。手稿是用十七世纪的书写体署名的:“手稿……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W.史密斯著……1565年。”有关这项说明的重要意义,将于下文加以讨论。

这个文本没有标题,没有目录,但正文是完整的,除了在若干地方有些片语或句子由于抄写人的疏忽而漏掉了;还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足证抄写人的学识很差,工作做得马虎。有少数地方,在兰巴德的手里作了改正;有几行正文由他誊抄,他还在页边和册子的衬页上写了一些注释;但似乎没有想要系统地仔细检查文书的工作。

II. 另一手稿在各方面有很大差别。似乎无法追溯它早期的

来历；它属于泽西伯爵，并被说成是《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份报告》。它如今收藏在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从装订上看，它甚至是在1565年以前写成的；其笔迹完全同我们对其早期时间的推算相符。它包含目录和自始至终的边注；虽然它在第三次对话的末尾省略了几句，这份手稿的正文与兰巴德抄本的正文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另一方面，博德利图书馆的抄本却令人惊奇地避免了任何种类的誊抄错误；在新的一行开始的地方，有一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但句子的段落和标点是通篇被仔细地注意到的。这个册子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每一处的边注看来是由文书在抄的时候顺手写上的，虽然边注的语调与正文的语调截然不同。在手稿的较前一部分，出现第二个人的若干改正。这个手稿每页留有用线划出的阔边，很少有收缩字体的痕迹。

虽然正文没有重大差别，但有许多较小的不同。发言人的名字出现在页边，也出现在正文中；爵士的发言开头有“我说”这样的短语，或者在几句话之后或在每一发言的开头有“于是博士说道”的字样。只有一两处地方这种由谁发言的交代文字并不在正文出现。此外，博德利图书馆手稿的文笔在几处小的地方优于兰巴德手稿的文笔；前者所用的英语要流畅得多，文中一再应用定冠词，使谈话更为精确。

这种种事实似乎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博德利图书馆手稿文本同兰巴德手稿文本相比，是一种经过修改的、改进的文本。我们当然可以把目录表和边注看作说明各个发言人的文字，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增加的部分；就前者而言，它们有时用得相当拙劣。现在看来，抄写人很可能并不单纯是文书，而是个考虑周到、学识渊博

的人,他抄写时肯动脑筋,毫无顾忌地边抄边对原文作一些小小的改进。

III. 版本。有以下这些:

1581年 T. 马什印刷。

1751年 查尔斯·马什重印。

1808年 收入《哈利杂录》,第九卷。

1813年 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

1876年 新莎士比亚学会丛书,第六辑,第三号。

就版本而论,第二版和以后几版都是根据 W. S. 发行的 1581 年版本重印的。他的《献辞》含蓄地声称他曾写了那篇“对话”,但是在他指出正文中一些改动之处的特征以前,最好不要急于讨论他的资格如何。然而,要评价其工作的特征,多少是有些困难的,虽则两份手稿的一致性使人容易发现他蓄意改动的地方。主要的改动是代之以一长段关于物价上涨的语句,这种物价上涨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恢复重铸硬币之后就继续出现了。这个难题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探讨的;它把物价的继续上涨归因于贵金属从新世界的流入。人们通常认为法国的博丹是最早把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归诸于改铸硬币的作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于 1574 年^①;如果说 W. S. 并非不受别人的影响,那他至少是听从了博丹的意见,并用英语加以传播的。

其他一些修改决不是属于同样的性质;由于把明确的引喻变为意思模糊的措词,这种修改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马虎。关于圈地问题委员会的开头那一句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另一处谈

^① 博丹也许是《论物价极端高昂的原因》的作者。